

<<近代天津十二大学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近代天津十二大学人>>

13位ISBN编号：9787201069883

10位ISBN编号：7201069888

出版时间：2011-4

出版时间：天津人民出版社

作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页数：434

字数：30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近代天津十二大学人>>

前言

李树人天津是中国近代以来北方的重要城市，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金融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且在文化上也有着辉煌过去，对全国产生过重大影响。

天津是鸦片战争以来较早开埠的城市之一。

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早，中西文化碰撞，产生了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引领下，创造了灿烂的中国近代文化。

天津是兴办近代教育最早的城市之一。

维新时期，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在天津成立；严范孙、张伯苓创建了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刘宝慈创建了中国近代第一所官立小学。

天津是中国近代报业最先兴起的城市之一。

1902年《大公报》即在天津创办；以后又有《益世报》、《庸报》、《商报》陆续出版。

天津是传播近代思想的前沿阵地。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最早发表在由他创办的《国闻报》每旬增刊《国闻汇编》上。

近代以来天津出现过众多的文化名人，出生于天津或在天津生活工作过的名人，层出不穷。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曾有严复活跃在天津的新闻文化界，这位被毛泽东称之为“睁眼看世界”的先驱，对当时以及后来的中国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学贯中西的著名思想家、改革家梁启超，在天津完成了他的《饮冰室合集》。

著名的佛教大师弘一法师李叔同出生在天津，他早期的文化活动很多是在天津进行的，他在近代艺术如话剧、美术、音乐等多个方面都是开创者，都是走在历史的前头的。

著名语言大师赵元任也是出生在天津，他在许多领域特别是语言学方面，都有卓越的研究成果，作出过创造性的贡献。

中国社会学鼻祖陶孟和也是天津人，他的《社会与教育》一书，是我国最早的一本教育社会学著作。

他强调社会学一定要建立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建立在科学统计的基础上。

著名的甲骨文研究专家王襄是中国发现甲骨文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取得优秀成果的第一人。

天津又有戏剧界如孙菊仙、尚和玉这样影响深远的名家。

后来，诸如明清史专家郑天挺、中外史学大家雷海宗、元史名家杨志玖、美国史专家杨生茂，深谙中国古典文学的诗词大家顾随，古汉语专家马汉麟、裴学海，红学大家周汝昌，殷墟考古专家陈邦怀，戏曲大师杨宝森、厉慧良、骆玉笙、马三立、鲜灵霞等，他们都是享誉海内外的名人。

此外，著名作家老舍、历史学家范文澜、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等，也都曾经在天津工作过。

由此可见，天津的文化名人真可谓群星灿烂，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有成就的、在国内外都有影响的名人，更是不胜枚举。

这本《十二大学人》是从中选出的代表，仅仅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层面，说明天津在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和贡献。

这十二位学人出现在天津，足以证明天津是地地道道历史文化名城，那种认为天津仅仅是工商业城市的看法，是片面的。

综观这些学界的优秀代表，他们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学术成就，除了时代和他们的天资条件之外，都有如下的共同特点：1.立志高远，胸怀大志。

本书所介绍的各位大师，他们多数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走过来的，他们目睹了封建统治者的腐败，亲自尝受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人民的欺压和掠夺，他们立志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发奋图强，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他们励志苦修，努力学习和从事多种问题的研究，为的是改变中国的命运，使国家富强，摆脱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

他们学习和工作的目的明确，因而有无穷的动力，不怕千难万苦，终生奋斗不息。

梁启超、严复、王照这些改革派的先驱，他们都有这种品格，他们为鼓动改革而奔走呼号，经历了种种艰难险阻而毫不畏惧退缩。

<<近代天津十二大学人>>

他们的动力来自他们的一腔爱国热情。

2.意志顽强，锲而不舍。

书中介绍的十二位学人，他们之所以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都是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

他们定准一个目标，便终生为之奋斗。

梁启超、严复等改革家先驱，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放眼世界，吸收各国的先进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相结合，积极写文章出书，用以武装国民。

严复曾明确说，办报写文章的目的就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这些先驱者都是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的饱学之士。

他们用有限的生命写出了常人可能用几生都难以写出的华章。

如果没有顽强拼搏、锲而不舍的精神，是不可想象的。

梁启超只活了五十多岁，写出了近千万字的《饮冰室合集》，没有顽强的意志和超强的毅力，是根本不可能的。

甲骨文研究专家王襄，为了甲骨文的研究，把一部《说文解字》背得烂熟于心，对各地出土的先秦文物逐一进行考证。

辨识各种器物上的铭文，互相参证，才使得对甲骨文的研究一步步深入下去。

书里介绍的十二位大师，莫不是对自己研究的领域如此痴情，如此下工夫。

3.基础牢固，知识渊博。

这几乎是一切有成就的专门家所共有的特点。

书里介绍的诸位大家，都是自幼即打下了坚固的旧学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非常熟悉的人，都是幼功非常扎实的人。

他们个个都自幼熟读过《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对中国的历史非常了解。

同时他们又广泛涉猎，对相关文化知识非常关注、注意学习。

他们的知识面非常广泛。

梁启超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有着极高的学术水平，对有清以来的学术发展史有着精透的分析。

严复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如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法学等都有很高的建树。

郑天挺专攻明清史，但对中国通史也非常熟悉。

雷海宗教授既是世界史大家，又是能开中国史课程的少有奇才。

为了学习借鉴西方文化精华，他们又非常注意外语学习。

他们的外语水平都非常高，有的精通几国语言，这才使他们真正成为学贯中西的人。

像严复、梁启超、赵元任、陶孟和、何廉、方显廷、雷海宗等都是精通一国或几国语言的人。

赵元任不仅精通英语，而且对法、德、日、俄等国语言也能熟练运用，并懂得拉丁文和梵文。

他简直是语言天才，中国各地方言如浙语、粤语、闽南话、客家话等，他都掌握。

4.道德高尚，虚怀若谷。

中国传统文人都讲究道德文章。

本书介绍的各位大师，都是道德高尚、真正可称得起德才兼备的杰出俊才。

他们都有一颗爱国心，都是为了振兴中华而学习而工作的人。

他们都非常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

梁启超那感人的家书，今天都可用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

李叔同、郑天挺、雷海宗等对待教学的认真态度，至今感人至深。

他们的学生回忆起来都是满怀深情的。

他们都是大学问家，同时又都非常谦虚。

这几乎又是一个规律——越是有学问的人，越是虚怀若谷。

郑天挺可谓是明清史泰斗式的大师，但他待人、待学问总是持一种谦逊的态度。

他是一位真正的忠厚长者。

他总是先看到别人的长处，所以他当领导就能网罗真正有学问的人，使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

南开大学历史系正是因为有了郑天挺、雷海宗而闻名中外。

本书只选了十二位学人，但却代表了 this 历史时期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学人的整体面貌。

<<近代天津十二大学人>>

他们的学术成就，他们的奋斗经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当以他们为骄傲、为荣耀

。
2009年10月22日

<<近代天津十二大学人>>

内容概要

天津是中国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
在中国近代史上，众多有影响的风云人物出自天津。
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近代天津十二大学人》是“
近代天津名人丛书”之一，记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

《近代天津十二大学人》选了十二位学人，但却代表了近代这个历史时期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学人的整体面貌。
他们的学术成就，他们的奋斗经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当以他们为骄傲、为荣耀。

。

<<近代天津十二大学人>>

书籍目录

总序

序

近代天津第一学人严复

学贯中西的思想家梁启超

中国拼音字母的先行者王照

由儒入佛的律宗传人李叔同

我国著名甲骨文研究专家王襄

一代宗师赵元任

明清史学大家郑天挺

学贯中西的史学家雷海宗

中国社会学的鼻祖陶孟和

西方经济学理论教学和研究中国化的先驱——经济学家何廉和方显廷

高凌雯先生修志兴学事略

<<近代天津十二大学人>>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七、晚年的思想“回归”严复在英国时，孙中山先生也在英国，中山先生慕严之名，前去拜访。

在谈话过程中，严复认为，要挽救中国，改变民智低下的状况，需从教育入手，不然的话，即有改革，害之于甲者，将见于乙，混于丙者，将发于丁。

为今之计，惟从教育上入手，庶几逐渐更新。

中山先生不同意严复的看法，乃婉转地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我乃执行家。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严复又被管学大臣张百熙聘为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他在任上亲手厘定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

几经挫折，这时的严复阅历已深，对中西文化的观察比较，已较年轻时深刻多了。

当时，他与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同居北京，吴的思想十分保守，深惧因新学的传播而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归于寂灭。

严复却不以为然，他说，新学愈发达，传统文化愈能得到发扬，因为新学只能起到“他山之石”的借鉴作用。

后来严复在一首诗里，写下了“乾坤整顿会有时”的话，证明他对中国前途还是充满希望的。

这一年，他还写下了著名的《与（外交报）主人书》，在这封信里，严复除了为中国规划出新的教育体制外，还精辟地阐发了他的中西文化观。

他认为，中国当前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愚、贫、弱，而不是中、西和新、旧的争论，以及用什么、或不用什么问题。

只要能够解决愚、贫、弱，我们就可以“竭力尽气、皴手茧足以求之”，“虽出于夷狄禽兽（顽固派对西人的蔑称），犹将师之，等而上焉者无论已”，更不要计其中、西、新、旧。

不能改变愚、贫、弱的，“虽出于父祖之亲，君师之严，犹将弃之，等而下焉者无论已”。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中国目前的处境实在太可悲了，中国四万万人的遭遇太令人痛心了。

这些话曾被认为是中西文化兼容并蓄的金玉良言。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严复抵达上海，应上海知交之邀，在青年会讲演政治学，后将讲演稿整理为《政治讲义》，于翌年出版。

彼时，复旦公学（复旦大学的前身）在上海创办，首任监督（校长）为马良（相伯）。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马良赴日本，监督一职由严复继任。

不及一年，严复即因学校经费无着，向两江总督端方辞职。

旋应安徽巡抚恩铭的邀请，前往安庆就任安徽高等师范学堂监督，不久又因学生无端闹事，向安徽提学使沈曾植说明情况后，辞去职务。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严复又应直隶总督杨士骧之聘，回到天津。

在旅途中手批《王荆公（安石）诗集》以消磨时光。

他研究王安石是有所为而发的，他认为王安石的“变风俗”，就是自己所说的“开民智”。

王安石虽然是历史上有名的改革家，但失败得比商鞅、比王莽都惨。

究其原因，主要是社会上的苟且习惯不易祛，而人们又有妒嫉之性，以至权与名常成为众矢之的。

主观上，则是王安石不懂得适用于一郡一州的政策不一定适用于全国，如同今天适用于甲国的办法不一定适用于乙国一样。

再者，是王安石不了解反对新政而提出另一套办法的人，不一定就是坏人，而支持你、为你唱赞歌的，不一定就对你有利。

这种看法，无疑是深刻的。

后来，严复又把眼光扩大到宋代历史上。

他提出，研究历史应留心观察社会之异同。

古人好读前四史，主要是读其文字。

“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

<<近代天津十二大学人>>

主观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之八九，可断言也”。可惜的是，严复提出的这一重大课题，直到约半个世纪后，方为国内外的史学家所注意研究。从宣统元年（1909年）开始，严复似乎交了一点儿好运。

这一年，清廷增设学部，尚书荣庆聘严复为审定名词馆总纂，开资政院，严复以“硕学通儒”被定为资政院议员，后来又当上了宪政编查馆督议官。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过了不久，清廷又钦赐严复这位屡试不第的57岁老人，为“文科进士出身”。其实，严复对此早已麻木不仁了，这一天，严复写了一首诗《初七见邸抄作》，内有“生平献玉常遭刖（古代的一种刑罚，砍去双脚），此日闻诏本不图”之句，他那无所谓的心情，于此表现得是再清楚不过了。

第二年，清廷增设海军部，再授严复为海军协都统及海军部一等参谋官。

未几，改元民国，袁世凯窃得大总统职位，根据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的建议，任命严复为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当时北大共有学生五百余人，于1911年5月15日开学。

严复就任后，于北大的规制颇有更张。

如将经学、文学两科合并为一，改为文科，还自任文科学长。

后来蔡元培在评价这一改革时，认为严复所为，与德国之“新大学不设神学科相类”，可见其意义之重大。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严复任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还应邀参加约法会议和政治会议，每天都要把战事情形译送总统府备览。

帝国主义之间的你争我夺，动摇了严复对西方文化的信仰。

这时他已明白看出，“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

“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

“平等、自由、民权诸主义……乃至至于今，其弊日见，不变计者，且有乱亡之祸”。

这就是说，中国若再盲目取法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只能是自取祸乱。

就在这时，袁世凯上演了一出复辟帝制的丑剧，严复也因此一度陷入泥潭。

关于严复与袁世凯的关系，历史上便有些瓜葛。

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期间，慕于严复的大名，曾再四相邀，屡致延揽之意。

但严复深知袁的为人，采取了萧然自远的态度。

袁对此很是不满，说：“严某纵是圣人复生，吾亦不敢再用。”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光緒帝和慈禧太后先后死去，由光緒帝的侄子溥仪继位，其父载沣辅政，称摄政王。

载沣对袁世凯在戊戌政变时出卖其兄光緒的事一直衔恨在心，所以上台后便把身膺内阁总理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开缺，要他回籍养病。

对于袁世凯的能力，严复是了解的，彼时新君继位，用人孔殷，严复认为“项城（指袁世凯）乃朝廷柱石，奈何自毁栋梁”。

这些话传到袁世凯的耳朵里，被认为是知己之言，遂使前嫌冰释。

所以袁世凯一上台，严复就当上了北大校长，并非出于偶然。

及至帝制议起，时为袁世凯心腹人的杨度奉命组织筹安会，网罗社会名流，为复辟制造舆论。

严复硕学高才，名满都门，自然是首选的对象。

对于那时国体的变更，严复是有看法的，他曾说过：“人民程度不及，徒有共和之名而无其实。”

无奈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有人遂把此话告诉了杨度，说：“此人若为我用，则帝制增色不浅。”

于是杨度屡赴旧刑部街严复家中，表示“非得公为发起人不可”。

甚至不待严复同意，即署名为筹安会的六位发起人之一，且名列第三，并很快见诸报端。

严复得知这一情况，预感到大势不妙，想逃回天津租界，但门外早为荷枪实弹的军警所监视，只好杜门谢客，拒绝与外界往来。

几天后，梁启超在报上发表文章《异哉！

所谓国体问题》，在社会上引起极大轰动。

<<近代天津十二大学人>>

袁世凯乃密令总统府内史夏寿田携支票四万元前往严府，丐严命笔反驳，为严所拒。

最后改由孙毓文代笔。

帝制运动失败后，惩办祸首之议，盛倡都下，不少人劝严复外出躲避，但此时他的态度却很坦然，说：于复辟一事，“吾一言未发，一字未写，俯仰无愧，虽被刑，无累神明，庸何伤？”

不过严复究竟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他在事后检讨此事时，给了自己十六个字的评价：“当断不决，虚与委蛇，名登黑榜，有愧前贤。”

晚年的严复，从一生的奋发努力和坎坷经历中，得到了太多太多的感悟。

这时，他终于认识到，一个国家要想推行近代化的政治体制，需以全社会的智识和文明程度为转移。

即使西方一切都好，如果无条件地搬到中国来，也是非常危险的。

要想拯救纷乱的中国，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历史有过的那种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这一观点，就是后来流行于西方反过来又为不少中国学者所接受的“新权威主义”。

其次，是要用时代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和儒家学说，“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

四书五经，故[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

严复说这些话的时候，已是64岁的人了。

晚年的严复，身体和精力日渐不逮，自感“精神益断，喘咳支离，每执笔临纸，则昏沉欲寐，万不能如往日之神思锐猛，甚可哀也！”

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停止那终生都在迈进的脚步，这就是不断地向前追求。

严复虽然没有了年轻时的激进与激烈，但他毕竟回到现实中来了。

1921年秋，69岁的严复自觉病深，手缮遗嘱，交与儿孙。

其中有三句话，是他一生经验与阅历的总结，说得十分恳切：一、中国必不亡。

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二、新知无尽，真理无穷。

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

三、两害相权，己轻，群重。

不久，便病逝于福州郎官巷寓所。

严复属于最早一批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中国人，可惜的是，他没有找到马克思主义，没有找到社会主义，所以中国没有、也不可能跟着严复的思想走，而是严复最终迁就了中国的现实。

大学人严复一生对中国的学术、对中国的思想文化贡献是巨大的，但他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又是非常值得今人回味的。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